

米高與惡龍



十九世紀天主教墳場與香港

前言

那時在天上發生一場大戰，彌額爾和他的天神與毒龍交戰，毒龍和牠的使者應戰。牠們（毒龍和牠的使者）不能獲勝，在天上再也沒有位置了。那條大龍被逐出，就是那條古蛇，名叫魔鬼和撒旦的，迷惑整個世界的。牠被擲到地上，牠的使者也一同被擲下來。

若望《默示錄》

若望在《默示錄》中，記載了一場天上大戰。這一場大戰，是天使的墮落，永生與永死的寫照。

總領天使聖彌額爾(St. Michael)帶領眾天使攻打大龍(即魔鬼撒旦)和牠的同黨。這場戰爭裡，聖彌額爾擊敗了罪惡的大龍，這是永恆生命的新天新地的開端。

生與死、善與惡、光明與黑暗，掙扎與糾纏的狀態，是千百年來人們在面對生命、面對世界時，所不斷追尋、探問、祈求的問題。然而，在現代社會講求科學化、理性化的大趨勢下，不少人對理解死亡亦嗤之以鼻。「生死之意義」的反思，漸漸從個人的感觀經驗，變成由冷冰冰的醫學名詞去解釋。死亡在醫學上，形容著生物活動的永恆休止。然



而，不論我們如何以理性去解釋死亡，當我們遇到親友的離世，這些醫學上的解釋，並不能排遣我們心靈深處對亡者離去的憂傷，這一刻死亡彷彿成為我們的一部份。

在商業大廈林立、「馬照跑、舞照跳」的快活谷，近在咫尺，卻埋葬著一群見證香港社會發展的亡者。跑馬地天主教聖彌額爾墳場於一八四八年屹立，門上的塑像，那象徵亙古以來的爭鬥，手執長矛的聖彌額爾與被矛刺殺死的惡龍……彷彿告訴我們生與死的對立。百載六十年的歲月，在時間的磨蝕中，這些石碑不單留下歷史的印記，也見證著他們對信仰的反省。讓我們一起推開這道斑駁的門，在這石碑叢林與石屎森林交匯之處，細聽這群亡者的訴說，展開一趟歷史與心靈之旅。

目錄

內容

頁碼

沼澤上的安息地	— 聖彌額爾墳場的歷史	2
石頭的故事	— 雕塑的意義解讀	4
生死與使命	— 天主教教區與修會歷史	10
殊途同歸	— 不同族群的亡者	17
結語		23

ST. MICHAEL CATHOLIC CEMETERY

天主
教
墳
場
聖
彌
額
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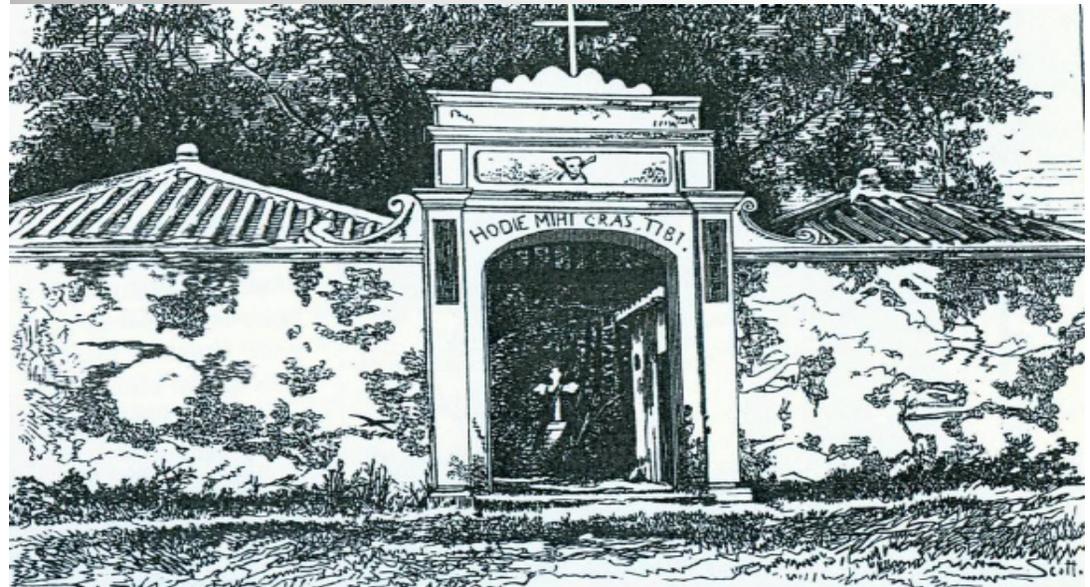
聖彌額爾墳場
ST. MICHAEL CATHOLIC CEMETERY

沼澤上的安息地—聖彌額爾墳場的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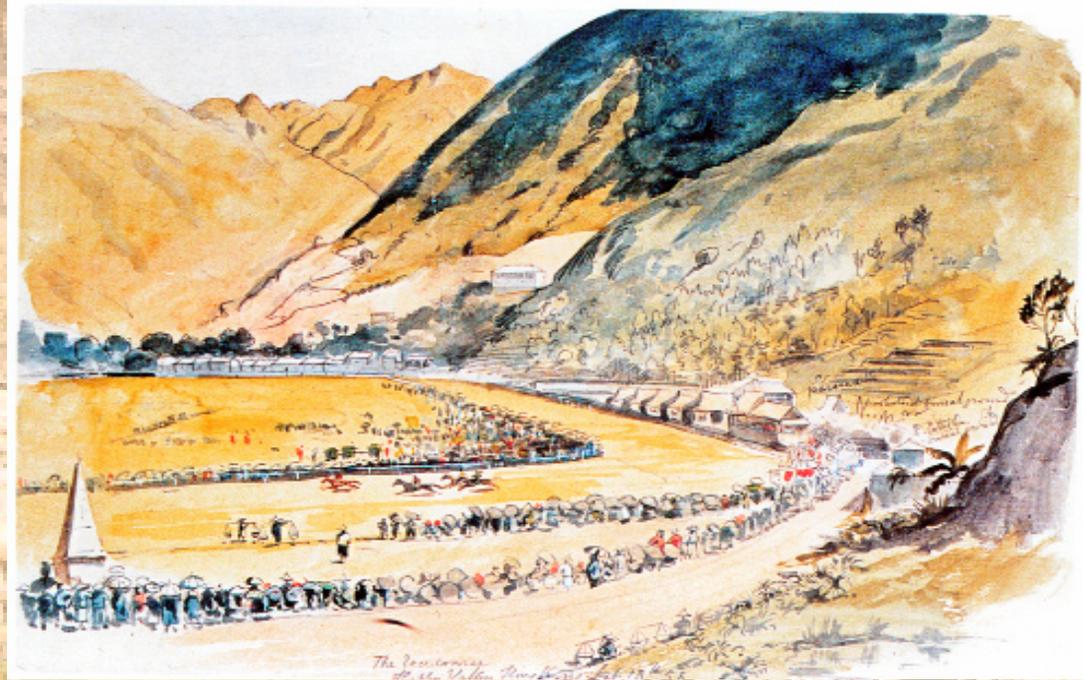
當你走進聖彌額爾墳場，你可能會問：為甚麼這個讓亡者安息之地，會屹立在一個高樓林立、鄰近馬場、人車往來頻繁的地方呢？那麼我們就要由一百六十年前，香港開埠時期維多利亞城的發展說起……

1843年田土廳廳長 (Land Officer) 哥頓 (A. T. Gordon) 曾就香港城市發展草擬首個有關城市發展的藍圖建議書。哥頓在計劃書中建議以黃泥涌為城市中心區、中環及鐘半山則開闢為政府山，而皇后大道以東則發展為華洋住宅區。當時港英政府，接納了哥頓的大部份建議，以開闢港島北岸，政府山以及黃泥涌區為重點的城市開發方向，惟獨以黃泥涌為城市中心區一項被政府駁回，理由是由於黃泥涌谷地勢低陷，容易受沼澤瘴氣影響健康，故此最後並沒有以黃泥涌谷一帶發展為城市中心區。

「黃泥涌谷」，又名「快活谷」(HAPPY VALLEY)，又稱「跑馬地」。1844年，英政府於黃泥涌一帶進行排水改善工程，後來旋即開闢平地，並興建時至今日仍然使用的快活谷馬場。那麼今天所見的聖彌額爾墳場又於何時興建呢？又為甚麼會在馬場鄰近興建呢？香港開埠初年，衛生環境惡劣，當時外國人對亞熱帶病毒知識貧乏，士兵及傳教士因病死亡的個案十分普遍，因此墓地的需求亦備受關注。於是1842年若瑟神父 (Theodore Joeset, 1804-1842) 到港後，即向政府申請墓地以供天主教徒安葬。



政府及後批准這項申請，並把位於灣仔，即現時聖佛蘭士街與秀華坊之向山一帶土地配撥天主教作墓地之用。次年，副監牧陸懷仁神父 (M. Navarro, 1809-1877) 要求政府另配葬地，以應付士兵死亡率高的問題。於1845年，政府批准有關申請，配給位於西灣 (現在的柴灣) 的土地。後來，又因人口急增，教會便再申請另一墓地以紓緩葬地之需求。1848年，政府批出一幅位於黃泥涌香港墳場以北的土地給天主教會，並象徵性地每年收取租金一元正，為期 999 年，條件是要求教會停止灣仔墓地的使用，將有關土地交還政府，而這一幅位於黃泥涌的墓地，正是今日的聖彌額爾墳場。



快活谷馬場與墳場(1866)

(From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5 May 1866)

圖中右邊一帶斜坡為聖彌額爾墳場、香港墳場與及巴斯墳場。

左邊是馬場。起初，賽馬是娛樂性質，並沒有賭博成份，乃至1890年，香港開始舉辦賽馬博彩，從此賽馬由原來的純粹娛樂性質增添了賭博成份。

石頭的故事—雕塑的意義解讀

墳場不單是一個埋葬亡者的地方，更寄託了人心靈深處對不朽的追求。墳場中的石碑石墓，除了用作識別亡者之用，更是生者為了紀念亡者而設立的。在聖彌額爾墳場內，飽經歲月洗禮後石碑上的字跡，在過了一個半世紀的今天仍隱約可見。在墳場內，面對一塊塊的石碑，你可曾發問：為甚麼是石頭？為甚麼人會以石頭製作亡者的碑記與雕塑呢？

「堅如鐵石」、「金石不渝」，石頭在人的心目中代表了堅硬、永恆。人以這種堅硬的天然物料去製作墳場的碑記雕塑，也許表達了生者對亡者的永遠追憶。然而，世上沒有不朽的事物。隨著時間的流逝，石頭漸漸被風化侵蝕，刻在石碑上的文字也漸漸剝落模糊，雕塑出現裂痕黯黑。因此當我們走進墓群之中，便可以看到碑記雕塑隨時光而被侵蝕的痕跡。

從墳場內各類的風化，我們可以得悉墳場裡的石頭，並不能永垂不朽，而是隨著年



月被風化侵蝕。因此從石碑的風化程度，可以推算石碑的建造年份。而由於不同的石頭有不同的抗蝕力，因此造碑的石材是決定墓碑價格的重要因素；例如石米，是由碎石加上水泥，故為廉價的造碑物料，花崗石是香港普遍的石材，故此為香港普遍石碑的材料；而雲石由於外表易受雨水侵蝕而呈粉狀，故此必須定期保養打磨，保養成本甚高；抗蝕程度最高的火山岩石材更是價格高昂，而且在香港較難找到，需要從外國訂造。因此從墳場石碑的石材，不單可以分辨立碑的年份，或許我們更能從石碑雕塑的石材，分辨到亡者家庭的經濟狀況。



除了用石料為亡者製作石碑外，生者更運用石材製作不同的形象，以追憶亡者。在聖彌額爾墳場內可見的形象有：柱狀、天使像、聖母像、十字架、船錨等。透過不同的形象，不單表明了亡者的信仰，而且更反映了生者的信仰及其對死亡的看法與價值。

【墳場裡的生態：石頭の種類】

在聖彌額爾墳場內，主要用作製作石碑的石材有：花崗岩、火山岩、雲石、石米等。

墳場內常見的石頭：

花崗岩(Granite)：

礦物組成： 石英、長石、白雲母。

花崗岩是一種火山岩漿在地表以下凝卻形成的火成岩，主要成分是長石、雲母和石英。花崗岩質地堅硬，難被酸鹼或風化作用侵蝕，常被用於建築物的材料。



【墳場內的風化】

在墳場內我們經常見到大小不同的石碑和雕塑，這是因為人類希望以石頭象徵對亡者不朽的紀念。然而，從墳場的石碑，我們能見証「石頭不朽壞」只是人的期望，事實上不同石頭隨著不同的環境因素，皆受著不同的程度及不同種類的風化。

物理風化

在風化過程中，岩石本身並未有任何化學改變，而岩石和礦物逐步崩解成碎塊以至碎屑，這便是物理風化作用。物理風化主要因為溫度變化，不同礦物對熱脹冷縮的反應並不相同，受熱後膨脹和冷卻時收縮的速度並不一樣，經過反覆的受熱膨脹和冷卻收縮後，岩石的節理便會擴大，使岩石沿裂縫明顯地分裂，當裂縫不斷增加，而一些礦物熱脹冷縮程度較大，遂使顆粒脫離母岩，甚至使岩石和礦物破碎。墳場中有些含有粗粒的岩石，如花崗岩等，其主要由石英、長石和雲母組成，有明顯的節理，因此容易出現礦物鬆脫積聚等情況。

化學風化

化學風化是指空氣中的氧和水溶液不僅使岩石和礦物的化學成分發生變化，而且使一部分被溶液帶走，或使穩定的礦物變為不穩定的礦物。在香港，濕熱的氣候促進了各種化學風化作用，由於本地岩石節理較多，使風化效果深入地下，往往形成深厚的風化殼。例如花崗岩有不同方向的節理，在濕熱的天氣下，節理擴闊，雨水沿著節理滲入，加速化學風化，而外層岩石中的黑雲母首先被氧化呈鐵銹色，接著長石亦被風化，祇有堅硬的石英不受化學風化影響（但石英會因物理作用而破碎為沙粒）。



生物風化

生物風化作用是指受生物生長及活動影響而產生的風化作用。生物機械風化主要源於動植物的活動。墳場中主要的生物風化來自墳場中的植物。由於不同植物的根系生長使岩石裂縫擴大，引致岩石破壞分裂；可使岩石破碎，土粒變細。同時，在墳場的下葬遷葬等工程需要，不斷挖洞掘穴，使岩石或岩屑間的空隙擴大，讓更多的水和空氣進入，促進化學風化作用。



細心觀察你可發現，墓碑被風化侵蝕的痕跡。



【雕塑形象與碑記符號的象徵意義】

石柩

石柩具有等待的意思，象徵等待末世的來臨，人從死亡中復活，面對天主的審判。石柩在西方墳墓中，常被用作稱為靈柩臺的大型墓碑的一部分。石柩會被置於中央，在其之上是亡者的雕像。在聖彌額爾墳場內，最常見的是箱型及屋脊型石柩。



天使

天使 (Angel) 一詞即天主的使者/送信者 (messenger)。在新舊約聖經中均有提及天使。基督宗教的天使傳承自希伯來文舊約聖經。在創世紀中，神派「革魯賓」(Cherubin) 手握四面轉動噴火的劍守衛通往生命樹的道路。另外，聖彌額爾 (Michael) 作為忠於天主的天使領袖，戰勝撒旦 (Satan) 並將之從他們當中驅逐出去。

錨

在西方文化中，海軍及船員皆以錨作徽號。由於錨能穩定船身，減低海員在洶湧波浪中的危險，因此在基督宗教的傳統中，以錨象徵對信仰堅定不移的信心，並代表耶穌贖罪拯救的確據。



石柱

折斷的石柱代表生命驟然消逝的哀痛。對天主教徒來說斷柱除了象徵生命的逝去，他們更認為虛空中有另外半條無形的柱直接延伸至天上無窮無盡。這正是象徵死後永恆生命無窮無盡的信念與付託。



R.I.P

原文為拉丁文：「Requiescat In Pace」(英譯：May he/she rest in peace)，其意思為安息於平安。



希臘文基督「ΧΡΙΣΤΟΣ」之前兩字母「ΧΡ」，兩字重疊在一起，象徵基督 CHRIST。



INRI

INRI 為拉丁文「Jesus Nazarenus Rex Judaeorum」。四字的縮寫（若十九19-22）。英譯：「Jesus of Nazareth, King of the Jews」，其意思是納匝肋人耶穌、猶太人的君王。



生死與使命—天主教教區與修會歷史

沿著墳場正中的大道向聖堂前行，兩旁是十九世紀的墓群。在路的右側，假若我們稍加注意便可發現兩大片自成系統的集體墓群，這便是在香港開埠初期便來港傳教的修會墓地。開埠早期，香港只不過是一條小小的漁村，可以說是一片荒蕪之地。是甚麼令這一班修士甘願跨越重洋，來到這生活條件困苦的異鄉？而他們在這片土地上又經歷了甚麼？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

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

沿路遇見的第一個修會合墓墓群，是被整齊墓碑圍繞的長方形合墓。合墓的石碑上豎立著一個十字架，十字架的左右屹著一對天使。這便是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的墓地。

十九世紀中葉，晚清衰落的時候，外有列強侵略，內有太平天國的戰亂，而香港成為了無數難民的避難所。大量湧入的難民，生活朝不保夕，也使社會上向來已有的棄嬰問題更為嚴重。這班修女在傳道之外，更擔起了教育收養棄嬰的工作，福音也因而在生命與生命之間傳遞。

然而，在惡劣的衛生環境中，不少修女因工作中感染疾病而在二、三十歲便獻出了生命。然而憑藉著信念與理想，一批又一批的修女仍義無反顧地前來履行心中的使命。其後，聖保祿女修會創立了聖保祿學校、聖德肋撒醫院和聖保祿醫院，以廣傳福音並推動香港教育及醫療發展。



【人物小傳】

歐仙修女

Sr Alphonsine Calixle Forcade (1813-1850)

Calixle Forcade 是科主教 (Bishop Forcade, Theodore Augustin ,MEP. 1816-1885) 的姐姐。

科主教在1847年獲委任為香港宗座代監牧，負責早期香港的教會事務。有見香港醫療設備落後，留港外籍人士的子女未有足夠的教育照顧，以及華人棄嬰問題嚴重，他邀請了法國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來港，協助教會傳教及慈善關社工作。

為回應科主教的邀請，四位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的修女：歐仙修女、奧加斯加露亞修女 (Sr Auguste Gallois)、加比利祖冰修女 (Sr Gabrielle Joubin) 和露意斯修女 (Sr Louise Morse) 飽歷風險，在海上航行了四個月後，於一八四八年九月十二日由法國抵達香港。

面對剛被英政府管治了只有七年的香港，在衛生環境惡劣、資源短缺的情況下，加上香港的氣候、生活條件與法國差異極大，對於這班早期修女來說是極大的考驗。另一方面，繁重而又急切的慈善事務，使她們健康程度每況愈下。

1950年10月以後，歐仙修女因患上腦膜炎而辭世，享年37歲。她的弟弟科主教，更以「慈愛的殉道者」(Martyr of Charity) 形容歐仙修女為社會慈善事業的努力。



嘉諾撒仁愛女修會 Canossian Daughters of Charity

嘉諾撒仁愛女修會於1860年由意大利來港服務。來港初期，修女寄居於一名天主教信徒 Leonardo D'Almada e Castro 家中。後來得到他的大力捐贈，建成位於堅道的修道院。嘉諾撒修女們在港主要從事教育工作及社會服務，她們在堅道開設意大利修院學校(Italian Convent School)，即今日的嘉諾撒聖心書院。

【人物小傳】

Emily (Aloysia) Bowring, 1833-1870

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墓地的石碑上，可以發現有一位修女名叫雅雷詩(Aloysia)，她是香港第四任港督寶靈(Sir John Bowring)的女兒。作為一個英國人，特別是一位港督的女兒，她信仰天主教有一段頗為曲折的故事。當時正值十九世紀，英國發生了牛津運動，不少基督新教教徒重新回到天主教當中，其中一位就是寶靈的兒子、雅雷詩的哥哥。

寶靈本身是一名新教教徒，為了避免女兒重蹈兒子覆轍，於是就在出任港督時將雅雷詩一同帶到香港，希望離開了牛津運動的影響，女兒便不會學兒子轉信天主教。然而，雷詩雅始終堅持自身的信仰，當她面對香港當時惡劣困苦的環境，不但沒有退縮，更找到了自己的使命。當寶靈任期圓滿離港時，雅雷詩故意躲藏，最終留在香港，後加入了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她留港從事教育工作，在意大利嬰堂學校的英語部任教，後成為該校校長。可惜十年後因感染瘧疾逝世，年僅三十七歲。



神職人員墓地

香港天主教的神職人員墓地位於墳場正中十字路口，面向教堂的左邊。墓地的中央屹立著一座飾以銅製十字架的墓碑，在四周平放的神職人員墓碑中十分突出，這便是穆神父 (J. Burghignoli, 1833-1892) 的墳墓。穆神父是十九世紀中末香港代牧區的副代牧兼宗座傳信部駐華總務長，受到當時葡國人愛戴。在他死後，葡國人為他樹立起在墳場上最顯眼的金屬十字架以紀念他，為穆神父留下了一塊永久的墓地以對其貢獻的認同與肯定。墓園中，更有不少大家熟悉的已故天主教神職人員，如胡振中樞機等。

甚麼是宗座監牧區、宗座代牧區、教區？

一八四一年教廷在香港成立宗座監牧區。所謂「宗座監牧區」是直屬教廷傳信部的一個最雛型的傳教區，通常由一位神父擔任宗座監牧。一八七四年，香港宗座監牧區升格為宗座代牧區。「宗座代牧區」也是直屬教廷傳信部的傳教區，但其首長由一位主教擔任。不過，這位主教按照天主教教律不是該區的主教，而是歷史上一個古老教區的領銜主教。一九四六年，教廷把中國的所有宗座代牧區一起升格為教區，就此成立中國聖統制。香港宗座代牧區也成了教區，有自己的教區主教。而當時仍是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擔任。



基督學校修士會 De La Salle Brothers

在聖彌額爾聖堂右邊是基督學校修士會（又稱喇沙會）的修會墓地。在這墳地，有一個祭台式的石墓，石台上可見到一星形符號，這便是基督學校修士會的標記，象徵信仰之光。喇沙會是聖若翰·喇沙 (St. John De La Salle, 1651-1717) 於一六八四年在法國創立。這個修會在一八七五年來港，首批傳教士包括來自馬賽、巴黎以及倫敦的修士。當時，他們來港的首要工作是接辦聖救主學校 (St. Savior School)，後來改名為聖若瑟書院 (St. Joseph College)。



聖堂與神職人員骨殖場

位於墓場中心的聖堂，是一個呈半圓頂部的圓柱形建築物，象徵最接近神聖的所在。在聖堂正面的堂頂上，有著「PAX」的拉丁文字，意思是平安。走入聖堂，那由一個又一個圓形與圓拱形組成的內部結構，是羅馬式建築風格。聖堂除了用作舉行安息禮等教會禮儀外，在以往亦有地下室用作安放神職人員骨殖的地方。在聖堂內，牆壁上的石板刻有早期在聖彌額爾墳場內安葬的神職人員的姓名，後來由於地下室容量飽和，所有神職人員的骨殖被遷到聖堂後面的粉紅色骨殖壁內，以方便教徒、公眾悼念。



聖堂內壁刻有早期安葬的神職人員姓名的石板



聖堂外貌

走出聖堂，來到聖堂後這道高聳的骨殖壁前，可以看到不少為人所熟悉的神職人員的骨殖位。而在聖堂正後方骨壁中央，可以看到一個十字架浮雕，浮雕上刻著耶穌之名的縮寫「IHS」。葬在該處的十九世紀神職人員有：若瑟神父（Joset, Theodore, 1804-1842）、高主教（Timoleone Raimondi, 1827-1894）、譚神父（Antonius Tam, 1857-1875）等。修會和傳教會是天主教早期在香港發展的主要動力。他們往往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及教育工作，貢獻香港。通過瞭解神職人員和修會的墓地及他們的生平，不單可以從中體會他們對生命的體會與對信仰的堅持，也讓我們可以瞭解天主教在十九世紀香港社會發展的歷史與因由。

【人物小傳】

若瑟神父

Rev. Joset, Theodore (1804-1842)

生於一八〇四年十月，為瑞士籍教區司鐸，一八三〇年晉鐸。曾任傳信部駐澳門代表，一八四一年四月廿二日成為香港首任宗座監牧，一八四二年三月三日抵港，一八四二年八月五日在香港逝世。



高主教

Bishop Timoleone Raimondi (1827-1894)

一八二七年五月五日在意大利米蘭出生。一八五零年五月廿五日在米蘭晉鐸，並於同年十月七日加入米蘭傳教會(後改稱米蘭宗座外方傳教會)。一八五八年，按照教廷傳信部的計劃，香港監牧區交由米蘭傳教會負責管理；高神父於五月十五日抵達堅尼修士(Br. Tacchini)抵港。一八六零年六月，獲委任為副監牧及副總務，接替回意大利的 Reina 神父。一八六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奉委為宗座監牧，接任較早前逝世的盎監牧(Ambrose)。一八七四年，香港監牧區晉升為代牧區，高神父獲委任為首位宗座代牧，並於同年十一月廿二日祝聖為主教。於一八九四年九月廿七日逝世。

譚神父

Antonius Tam (1857-1875)

於十八歲那年從澳門來港，加入傳教區修院，一八七五年六月由高主教祝聖為司鐸。然而，在晉鐸六個月後，便發生了悲劇。

當時，副代牧兼傳信部代表處總務長穆神父(J. Burghignoli)寫道：「譚神父於十一月三十日遇溺。當日，他與一名華人教徒，和一名非教徒木匠乘坐小船離開汀角，在經過汀角灣的時候，船隻傾覆。該名教友善於游泳，所以能夠游回岸上求救。譚神父為那位非基督徒施洗，兩人抱著一塊浮板掙扎了差不多半小時後，便一起溺斃。」(神思第 47 期 2000 年 11 月)



殊途同歸 — 不同族群的亡者

在聖彌額爾墳場內，共有192位十九世紀的亡者，他們分別來自不同的族群。除了之前所介紹的法籍、意籍神職人員外，主要的平信徒包括了：愛爾蘭人、葡萄牙人、以及華人等。而在香港開埠之初，不論在教會事實，還是社會發展上，這一群天主教的平信徒，特別是隨著英國殖民而來的愛爾蘭人和由澳門而來的葡萄牙人，貢獻良多。

愛爾蘭人墓地

在殖民地時期，英國派遣來港的士兵大多不是英國人，而是來自其殖民地愛爾蘭及印度的士兵。愛爾蘭人多信奉天主教，因此英國的愛爾蘭士兵也多為天主教徒。在聖彌額爾墳場內，確定為愛爾蘭人的亡者約有十一位，其中五位是警察，一位是船員。

在聖堂左面的一群墓地中，可看到一個其貌不揚的十字架墳墓。這平平無奇的墓地的主人翁正是愛爾蘭平信徒當中最具影響力的一位。他的名字叫約瑟(John Joseph Francis, +1901)。約瑟起初為軍隊炮兵，如大多數愛爾蘭士兵一般隨英國軍隊來到中國。其後他移居香港，並轉讀法律，之後更憑著努力成為了英皇御用大律師。

在十九世紀末，他曾與高主教合作爭取政府准許辦學團體在接受津貼的學校內提供宗教教育。在一八九四年香港爆發鼠疫期間，約瑟更獲政府委任為衛生局臨時成立專治鼠疫委員會主席，負責處理危急的鼠疫。在他的努力下，終於將鼠疫控制，擊敗了疫病與死亡的威脅。





葡萄牙人墓地

在聖彌額爾墳場眾多外籍人士墓地中，屬於葡萄牙的墓地佔大多數。葡萄牙人是早期香港天主教會主要信徒群體。他們大多來自澳門，因工作緣故移居香港。當時葡萄牙人主要替英國人當文員和從事商行工作。另一方面，在十九世紀香港天主教會的發展中，這些葡萄牙信徒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對修會在香港的發展的也有很大的貢獻。此外，香港在威靈頓街及擺花街附近興建的第一間天主教堂，葡萄牙人亦捐贈了一千三百元葡幣。而一八八八年落成的堅道主教座堂，亦以葡萄牙人捐獻最多。

聖彌額爾墳場內安葬了很多香港著名的葡萄牙人，包括曾任布政司署首席秘書長的 Leonardo D'Almada e Castro 以及在香港印刷業舉足輕重的葡裔 Noronha 家族。這裡且讓我們認識一些有關他們的事跡：

Leonardo D'Almada e Casto (+1875)

Leonardo D'Almada e Castro 的墓地設計呈石棺形。他是十九世紀在港葡萄牙人中擔任最高政府職銜的要員，官至布政司署的秘書長。最早期來港的澳門葡人，通曉粵語英語，很多時擔任書記的職務，是華人與英國人的溝通橋樑。港督軒尼詩(Hennessey)在任時，曾尋獲英國殖民地大臣的一封舊信件。這信件的內容是要求第四任港督寶靈(Sr. John Bowring)委任Leonardo D'Almada e Castro 為政務司(Colonial Secretary)，可是當時寶靈並沒有依據這項要求升遷他。另一方面，Leonardo D'Almada e Castro 曾在堅道購買了多塊地皮，後來贈予天主教或廉價轉讓。而嘉諾撒仁愛女修會早期來香港時也全靠他的幫助才能順利發展與建立修道院。他對香港天主教的發展可謂功不可沒。



Noronha 家族

十九世紀在港工作的葡萄牙人地位雖然次於英國人，但卻比華人地位高。當時，澳門葡人對香港印刷業貢獻很大。1844年，Delfino Noronha (1824-1900) 在香港開設印字館「Noronha. Co」，是第一位來港開拓商業的澳門葡人。其印字館負責承印《香港政府憲報》及其他政府刊物。及後，更名為「Noronha & Sons」，包辦英國駐華使領館印務，兼營一般書籍文具等業務。港督麥當勞 (Richard MacDonnel) 更承諾，假若該印字館的表現優良，政府將會永久聘用。在現有十九世紀的外文書籍中，我們還會發現很多書籍也印有「Noronha」印刷商的名字。



華人墓地

從人口比例來說，葬於聖彌額爾墳場內的十九世紀華人信徒為數極少，共有三十二個墳墓埋葬了四十位華人。不過，這個現象並不能完全反映當時華人信徒的人數。背後的其中一個原因是華人的鄉土觀念。十九世紀大部份內地移港居民皆為暫居性質。由於中國人有落葉歸根的思想，不希望客死異鄉，故此每當暫留的華人，健康有問題，或年老不適，便會提早回鄉。不幸在港逝世，他們的親友大都安排亡者返鄉安葬。故此，不少華人天主教信徒亦可能選擇回鄉安葬，而非安葬於天主教墳場內。這三十二個墳墓代表了當時亡者及其親人的一個選擇，就是以天主教的殯葬和悼念儀式來紀念先祖，而不再以華人的宗教行為來供奉祖先，表現了天主教的西方文化對當時中國人的影響。

聖彌額爾墳場內大部份華人信徒墓碑都採用香港慣常可見的設計，即在一個豎立的長方形石碑上以中文刻上亡者姓名、聖名、出生及死亡日期和立碑者姓名。華人信徒楊永康(生於道光九年；卒於光緒二十九年)之墓正是一個典型的華人信徒墓碑的例子。這個墓碑是由其兒子錦宗、欽

宗、銘宗、銓宗和孫兒鴻發、鴻章、鴻振、鴻昌、鴻安、鴻謙、鴻賢、鴻鑽所立，表達了整個家族對先人的孝心。

然而在華人墳墓當中亦有罕見的例子，如吳春華夫婦二人的墳墓採取了十字架形式，並附有中、英文碑文。并以英語刻有下列銘文：

DEAR IS THE SPOT WHERE CHRISTIANS SLEEP
AND SWEET THE STRAINS THAT ANGELS POUR
O' WHY SHOULD WE IN ANGUISH WEEP
THEY ARE NOT LOST BUT GONE BEFORE



細看完這一位又一位天主教信徒的過去，我們可以了解到這一群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的天主教徒們，如何在這一片土地上為著他們的信仰而努力，又如何在此找到了生命最終的處所。不論是英國人、愛爾蘭人、意大利人、法國人、葡萄牙人，還是華人，都安息在這同一的空間，等待他們按信仰所期盼的天國的來臨。



他朝君體也相同

結語

步出聖彌額爾墳場的大門，高樓大廈的林立、繁忙馬路上的車聲迎面撲來。在大門上的刻句：「今夕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這是亡者對生者的最後話語，也是對於人生真諦的啟迪。

墳場旅程中的種種，讓我們反思有關生命的課題：生命為何？人死何往？今天，我們以生者的身份進入墳場悼念亡者、追憶沈思；他日，我們也終成為亡者被別人埋葬悼念，那我們又能為來者留下甚麼？

今日當我們考察聖彌額爾墳場，探訪有關十九世紀的墓地，認識不同族群見證的香港故事。或許我們沒法回到十九世紀的香港，但透過考察墳場，閱讀石碑雕塑，我們將能想像十九世紀有關香港的人、事、物。這讓我們重新思考人與歷史，生者與亡者的關係。

由此，墳場不再只是一個埋葬與遺忘的地方，它所承載的歷史痕跡與對生死的反思，是現代都市躍動下的一片淨土，也是都市人在瞬息萬變的城市空間下一個追思過往、探問人生的停泊處。

今夕吾軀歸故土

《米高與惡龍》

編撰 夏其龍
執行編輯 陳榮豐
助理編輯 胡 希
出版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
香港 新界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電話 (852) 3163 4277
傳真 (852) 3163 4451

網址 www.cuhk.edu.hk/crs/catholic/CCS/index_ch.html
電郵 catholic@cuhk.edu.hk
承印 明愛印刷訓練中心
二零零八年五月初版
版權所有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
ISBN: 978-988-17181-2-9

Editor: HA Keloon, Louis
Executive Editor: CHAN Wing-fung, Vincent
Assistant Editor: WO Hei
Publisher: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852) 3163 4277
Fax.: (852) 3163 4451

Website: www.cuhk.edu.hk/crs/catholic/CCS/index_ch.html
Email: catholic@cuhk.edu.hk
Printer: Caritas Printing Training Centre
First Edition: May 2008
ISBN: 978-988-17181-2-9



出版機構



贊助機構



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
THE LORD WILSON
HERITAGE TRUST